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七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二期 ——
(二〇〇五年七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7a)

【人物春秋】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舒 云
【千秋功罪】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柳孚三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五）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春秋】

毛泽东为何选王洪文当接班人

• 舒 云 •

王洪文，1935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被捕前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是怎样被毛泽东看中，从而一步登天的呢？

◇ 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由来已久

在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警惕。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那时毛泽东说，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揭开了教条主义的盖子；“惧”的是除了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思想混乱外，也怕身后有人否定自己。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进而两国关系恶化，加重了毛泽东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胡乔木曾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对毛主席的刺激非常深。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如何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和在世时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考虑成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多年思考的结果。1959年11月，在杭州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三篇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讲话。杜勒斯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毛泽东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一定基础。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认为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说，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避免修正主义的确实保证。如果放松阶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杭州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强调，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其中有毛泽东的一段话，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强调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查和甄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这时候，发生了这么一件事。1964年，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不逢五不逢十，中国却派出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本意是希望和苏联重新搞好关系。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马上质问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这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随后在两党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又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道歉。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毛泽东就得出结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这个偶然性的事件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担心，这不是不可能的呀。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同地方一些省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1965年8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1966年6月，毛泽东在同一位外宾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 从党的九大开始，王洪文发迹

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毛泽东自己选过三个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

并白纸黑字写进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叛逃后，毛泽东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岁月不饶人，毛泽东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经再三考虑，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毛泽东选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

说实话，身在上海的王洪文再有名，身居北京的毛泽东也不可能认识，但老天却给了王洪文一个机会。1967年7月“七二〇”事件后，经周恩来安排，毛泽东从武汉来到上海，住到西郊顾家花园414号招待所，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造反组织。毛泽东深夜坐装甲保险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上海的形势与武汉大不一样，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他对张春桥说，要重建上海民兵，指示武装十万工人。张春桥问，要不要发枪？毛泽东说，每人发一条棍子。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正好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张春桥深知毛泽东要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所以就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将王洪文介绍给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红色履历”后，毛泽东非常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深夜，周恩来看望了他们。使王洪文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么多代表中，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张春桥主动避开了。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按照习惯，毛泽东首先问王洪文是哪里人。王洪文说，吉林省长春市郊人，1935年生。毛泽东屈指一算，正是伪“满洲国”时，长春改名“新京”，成为伪“满洲国”的首都。毛泽东问，家里是干什么的？贫农家庭，父亲早死，自己没有读完小学，就给人放牛放猪，也种一点田。16岁时报名参军，又跟部队参加抗美援朝。什么部队？二十七军。哦，军长是尤太忠，尤大麻子。我是军部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当了六年半兵，在部队入了党，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1964年调到保卫科当干事，“文化大革命”跟着毛主席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毛泽东打断，你现在是在工厂还是在“工总司”？王洪文说，在上海市革委会，也兼着“工总司”的工作，每个星期还要到厂里劳动。毛泽东满意地说，永远不要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这次谈话，王洪文给毛泽东的印象很好，后来毛泽东一再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

很多人都以为王洪文是在十大才发迹，其实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就“出人头地”了。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在10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10月31日闭幕式上，毛泽东在全体会上说，给大家介绍一个人，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一看。王洪文站起来。毛泽东说，他是上海“工总司”的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说，前年“安亭事件”就是他搞的。这次会议，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是太少了。回到上海后，王洪文向徐景贤等人讲了毛泽东接见他的过程，并把与毛泽东的合影送到上海展览馆展览。

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张春桥马上调整上海市革委会的座次，王洪文成了“王老三”，排在张、姚之后。接下来筹备九大，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党的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1969年4月13日下午，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4月14日，王洪文作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言。虽然大庆“铁人”王进喜也

是九大主席团的成员，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眼中已经“过时”了，张、姚主张另选“路线觉悟”高的造反派代表工人发言。由于王洪文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立过大功，理所当然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代表。4月13日下午，毛泽东才最后敲定发言人名单。明天就要讲，王洪文急死了。他知道这是自己在毛泽东面前表现的最好机会。王洪文让徐景贤赶快给他写发言稿，并让张、姚帮助审改。还向徐景贤借了15元钱，到大会小卖部买了一条黑色的确良长裤，配上新上衣，把自己打扮得更像个工人。

4月1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发言后，毛泽东宣布，王洪文同志讲话。王洪文走上讲台，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九大的重要讲话，拥护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新的党章。在第二天的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

因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九大279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只有53人是八大的委员。4月23日下午，毛泽东接见部分代表时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应该是一个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今后我们提拔干部，要在工厂、农村中选拔积极分子。王洪文就这样被选进了九大的中央委员会。因为张、姚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指定上海的工作由王洪文和徐景贤主持。

庐山会议上，王洪文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由于他和徐景贤及时向江青、张春桥提供了华北组六号简报，立了大功。所以江青在庐山别墅接见了王洪文，说知道吧，（毛泽东）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不傻，听懂了话外之音，高高兴兴地下了庐山。一向不读书的王洪文雄心壮志，表示要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他每天上午到徐景贤家读书，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以后又组织市委常委共同学习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埋头苦读了一些天，徐景贤建议，向毛泽东写个书面报告，汇报学习马列著作的收获，表态坚决揭露陈伯达一类的政治骗子，与林彪的“天才论”划清界限。这份报告被冠以“红头文件”，由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王洪文进一步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他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指示，负责上海地区的林彪专案工作。重要的材料由他派人直接送给周恩来转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王洪文应该是第一人选。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毛泽东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

◇ 王洪文没想到能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9月7日上午，王洪文坐飞机到北京，从此青云直上。不过这时包括王洪文自己，谁也没想到，他会越过张、姚，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姚住在一起。王洪文搞不清中央调他的意图，但重用他是肯定的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

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

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1972年11月，张春桥到上海，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说，洪文在北京，比我和文元都忙，我们只参加政治局的活动和中央的会议，他呢，总理开的会，他都要参加，国务院那一坨，中央军委那一坨，甚至连国家计委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而且他的文件也比我们多，总理指示，各个口都要向他送文件，他看都看不过来……看样子，洪文回不来了。张春桥宣布，经与姚文元和王洪文商量，上海的日常工作由马天水主持。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好感逐日增加。这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把王洪文放在张春桥之上了。他当面对张春桥说，王洪文当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当然，毛泽东也比较看重张春桥，但张春桥是个文人，积怨甚多，很难得到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1973年5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准备工作。周恩来宣布，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列席政治局会议。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并提出新的党章草案。

8月20日，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毛泽东让周恩来传达他的指示，要重视提拔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任副主任。周恩来宣布完，立即从主持人的位置下来，让王洪文接下去主持。

毛泽东选中王洪文，高层阻力很大。十大召开前，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周恩来重申了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评价，工农兵干部……比较全面，还主持过上海市革委会的工作，调到中央以后表现也是好的，所以要提拔这样的年轻干部……但周恩来说完，政治局委员谁都不吭声，张、姚不好抢先表态，坐在一边的王洪文十分尴尬。毕竟王洪文和刘少奇、林彪不同，没有资历。片刻，许世友忍不住了，小声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最后，叶剑英表态，重视提拔年轻干部，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在60年代，主席就多次说过，群英会中诸葛亮只有27岁，孙策小霸王17岁，周瑜当大都督时也只有30岁……我们这些人当军长师长时，有的还不到20岁。现在王洪文同志已经38岁了，我拥护主席的提名，赞成王洪文同志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总理之后。一席话扭转局势，王洪文勉强跃升到党内第三位。事后，王洪文对徐景贤说，他当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1973年8月24日，十大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

章的报告。开幕式结束，毛泽东宣布散会。8月28日开闭幕式时，毛泽东因身体不适缺席。代表们看毛泽东没有来，正胡思乱想，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

周恩来宣布投票开始，王洪文穿上新军装，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走到毛泽东的座位前，拿起毛泽东的选票。九大时，毛泽东提议，谁赞成选票上的名单就不必画圈，反对某人在姓名前打个叉。王洪文投下毛泽东的选票时，全场热烈鼓掌。这样，王洪文名正言顺地坐到了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

◇ “公子哥”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十大前，王洪文到上海调研，对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说，毛主席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古文他读不懂，要朱永嘉给他讲讲。朱永嘉是复旦大学教师，对古代史，尤其是明史非常熟，批判《海瑞罢官》前调到市委写作组。朱永嘉读完《刘盆子传》后，与徐景贤商量怎么讲。徐景贤出主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翻译古文，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其他什么话也不说。王洪文的政治嗅觉很灵，也很有心机，听完不动声色，只是随便问了问写作组的工作，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大有用意。西汉末年，放牛娃出身的刘盆子，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15岁时摸彩摸到皇帝的宝座。当了皇帝，仍与一班放牛娃玩在一起。王洪文的经历与刘盆子相似，显然，毛泽东借刘盆子提醒王洪文，按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只是侥幸依仗了刘氏宗室。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结果也会像刘盆子一样，最后狼狈地卷起铺盖走人。

王洪文当上接班人，待遇马上“鸟枪”换“炮”。钓鱼台16号楼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全面修缮后，让给王洪文一个人住，在八大处还给他新建了一座高级别墅。还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工作和服务班子，先后配备四名秘书，还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护士。八三四一部队派出警卫人员，一级保卫，外出时中央警卫局还要派一名科长跟随。王洪文在上海陪某国元首打羽毛球上了瘾，北京也专门设置了一个羽毛球馆。王洪文羽毛球瘾上来，连续打几个小时，仍精神十足。

王洪文本来就是“酒桶”，有酒必喝，酒量不算太大但贪杯。现在有了条件，更发展到顿顿少不了酒。酒足饭饱后就开始玩，打扑克、打麻将、打球、打猎、钓鱼、看电影，经常忙得连轴转。钓鱼到中南海、养蜂夹道，甚至到叶剑英住处。打猎到军用机场，拿着上海方面送的新式猎枪，用吉普车的灯光照着，秋天打野鸡，冬夜打野兔。不愧当过兵，王洪文的枪法很准，一枪一个，可以连续打几个小时。

从1973年9月12日，一直到1974年5月底，毛泽东16次会见重要外宾，都由周恩来和王洪文陪同。王洪文和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后，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当面批评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0月，“四人帮”决定派王洪文飞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王洪文，再次说，你们不要搞上海帮。自此以后，毛泽东明显冷淡了王洪文。周恩来病重后，毛泽东逐步把权力转移到邓小平身上。1975年1月8日，在十届二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增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在讨论国务院人选时，确定邓小平仅次于周恩来，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虽说由王洪文主持工作，但只是抓中央读书班，实权全在邓小平手里。1975年8月，王洪文被毛泽东派到上海“蹲点”。他在上海“窝”了几个月，国庆节也“懒”得回北京。

◇ 在“四人帮”中，王洪文实际上是傀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全国沉浸在狂喜中。

1980年12月19日，公诉人敬毓嵩对被告人王洪文所犯的罪行发言。认定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多年来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紧密勾结，狼狈为奸，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长达十年的持续犯罪中，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难以估量，被告人王洪文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公诉人敬毓嵩说，最后，我想讲一点适用法律的问题。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98条、137条和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被告人王洪文的罪行严重，民愤很大。同时，被告人在预审中和法庭上有一定的认罪和悔改表现，表示愿意承担罪责，这也是应当注意到的。请法庭根据被告人的罪行和认罪态度，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虽然王洪文的职务在“四人帮”中最高，但实际上，他要绝对服从江青、张春桥。因为是张春桥让王洪文当了造反派的第一把手，又是张春桥把王洪文推到了上海市的领导位置上，进中央还离不开张春桥。王洪文当然不能数典忘祖，只能感恩戴德，俯首帖耳。这样也使王洪文因“福”得“祸”，他的主要罪行是1966年12月、1967年8月参与制造武斗，1976年伙同张、江、姚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庭审中，王洪文没有请律师为其辩护。

终审判决，王洪文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在北京病亡。

~~~~~

## 【千秋功罪】

上海帮罪恶，谁来清算？——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 柳孚三 •

张春桥“寿终正寝”了，作为当年受张春桥重用、提拔和卵翼的上海文革干将徐景贤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例如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目前在大陆已被禁；他不明白当局为甚么对“文革”噤若寒蝉。我虽然也不明白，但很想看看他的《十年一梦》到底写出了什么“宝贵的历史资料”？

◇ 谁要对虐杀林昭负责？

文革时被囚禁在上海监狱的林昭，是我们民族最英勇的抗暴英雄。她在狱中二十万言的上书写完后，就被没收纸笔，她只好用血写下许多抗议文字，包括一些诗。林昭在狱中还有大量日记，记她受迫害的情形。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她的大会，当她被带出来时，口中已塞著橡皮塞子，此物是为禁止犯人出声而设计，随人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她颈上还勒有塑胶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而难受，竟惊呆到忘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震怒。

彭令范访问过一位不愿具名的、同情林昭的狱医，他说，有一次大咯血来诊，林昭已瘦得

不到七十磅，他快认不出来了。该医生证实：杀害林昭的当天上午，几个武装人员直冲入监狱病房，把正在吊葡萄糖的林昭从病床上强行拉起，并叫道：“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林昭从容不迫地要求换件衣服，也被拒绝。她走时对护士说：“请向X医生告别。”此时，医生正在林昭病房隔壁，“不敢出来，浑身发抖”。他对彭令范说，当了一辈子狱医，还没见过这样把病人抓走行刑的。

这幕人间惨剧，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上海市。这一天离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风暴”，已经一年多了。当时掌握上海市实际权力的，是人称“徐老三”的徐景贤，因为“老大”张春桥、“老二”姚文元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主要精力放在中央文革小组。上海市革委会的其他头头，马天水、王少庸是造反派“解放”出来的老干部，心有余悸，唯唯诺诺而已；王洪文、王秀珍等不过是打打杀杀的草包，所以实际权力都在熟悉政府运作的徐景贤手中。三十多年后，回想当年，“当时上海人叫我‘徐老三’，排在张老大、姚老二下面”，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也不过是“王小七”，甚至还抛出写给张姚的告密信以证明自己比王洪文更高明。看来，徐景贤对当年，仍然兴味无穷，心里美滋滋的呢。

那么，这个操千万上海人民生杀大权的徐景贤，对残酷迫害虐杀林昭一案负有什么责任呢？我把他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〇〇四年二月版，香港），据说花了十年时间写成的、四十多万字的巨著，从头翻到尾，竟无一字涉及林昭。

#### ◇ 谁要对刘文辉被祭旗负责？

还有一个叫刘文辉的上海人，他堪称是中国大陆五十多年来，最早、最激烈、最彻底、最系统的反革命、反毛泽东、反阶级斗争、反极左的第一人。在黑暗的年代，刘文辉决心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用自己的肋骨燃点火把，让人们睁开眼睛，辨别真伪，遏制毛泽东倒行逆施的祸国殃民路线。他写了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还想办一份《人人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深夜，经过深思熟虑的刘文辉伏案疾书，写成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然后复写成每份十张信纸的长信，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十四所大学。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刘文辉正气凛然地对弟弟刘文忠说：“古今中外，反专制、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下令，要上海公安局从速破案，刘文辉、刘文忠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深夜被捕。为了给改挂“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牌子的“红色新政权”立威，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用刘文辉祭旗。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凌晨四点，在不足五平方米的“私堂”内，由检察院的一个人，同时扮演检察院、中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角色，两个钟头内完成起诉、宣判、驳回上诉等一系列法律程式。刘文辉就这样被杀害了，年仅三十岁。他成了十年浩劫中，第一个被公开处决的反文革的殉道者、良心犯（刘文忠《风雨人生路》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出版，二〇〇四年十一月版）。但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对这笔血债也一字不提。

#### ◇ 胡懋峰喋血向谁讨还血债？

在杀害林昭的前两天，即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上海交响乐指挥陆洪恩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三十多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王友琴《文革受



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香港）。对这场集体大屠杀，当时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发表了报道和评论，死刑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可是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未赏著一字。

另一位胡懋峰，在狱中组织“孙文读书会”研读世界名著，批判文革。为人告发，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开枪杀（《风雨人生路》）。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也未对此作出交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十年浩劫中到底有多少人死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屠刀之下，有多少人死在徐景贤等人的朱砂笔之下？相信是永远无法破解的难题。这是由于中共最高领导层有人发了话：“清算毛泽东，就是清算共产党”“不要清算文革，要淡化文革”。文革成了禁区，所有文革资料都被当作“密件”、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即使是林昭、刘文辉等，在名义上已经获“平反”的人，今天上海市的公检法机关仍然拒绝把受害者们的档案以及有资料发还给他们的亲属。

#### ◇ 徐景贤亲手制造的冤案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张春桥的妹妹张佩淙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做手术时死亡。经各方面专家参加的调查组调查、研究后确认，死亡纯属意外事故。但徐景贤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又成立了由徐亲自指挥的绝对保密的“特别调查组”，要把医疗事故升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精心策划谋害张佩淙”并再扩大成“谋害柯庆施的政治事件”，欲致麻醉师方兆伙等于死地。

为了收集证据、罗织罪名，把方家的打字机、半导体收音机说成是发报机，把节能电灯说成信号灯。方妻万廷锦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被审讯二十三次，万因此瘦了三十多斤。被株连而被立案审查或传讯的包括方兆伙的大哥方兆祥、大嫂孙用余，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表姐夫钱宇人以及夫妇双方的同事、朋友，多达数十人。一年后，马天水、徐景贤们仍坚持，“纵使没有任何证据也要判方兆伙徒刑”，徐景贤最后定调：“判个七八年”。只因周恩来的干预，方兆伙才得在被秘密关押十八个月多，又送“五七干校”劳改一年后获释。（叶永烈：《张春桥传》）徐景贤到底制造了多少冤案，《十年一梦》也未有交待。

《十年一梦》中唯一提到迫害群众的只有一处：“上海因为参加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有两千五百人，一般请罪和写检查的不计在内，其中隔离审查、不能回家的，有两百多人，办学习班审查、但可以回家的，有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那么，徐景贤本身害了多少人呢？好像没有。因为他说，这些数字是“据有关部门统计”的，自然不关他的事了。虽然人血流成河，但徐景贤的双手是干净的。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所以，徐景贤可以厚着脸皮在《十年一梦》的扉页上大书曰：“我所写下的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是亲见、亲闻……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作回忆录的基本信条。”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的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〇〇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现在就以此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束吧：

发迹只因批海瑞，  
今到墓前能无愧？

嘻皮笑脸还照相，  
人间皮厚君为最。

~~~~~  
【难忘岁月】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五）

• 刘文忠 •

盲人修道士

监狱确实是座特殊的大学，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囚犯，只要留心、虚心学习，可以学到在平常社会生活中或书本上难以获知的学问。我从九座盲人修道士所说的经历中，就获得了闻所未闻的见识。

修道士三岁时被一个法国神甫从徐家汇天主教堂弃婴院抱到国外，自小青年一直在法国和罗马梵蒂冈受神学院教育。他与养父一样终身献给天主教事业，当一名终生修士（不结婚）。他精通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他是23岁时由梵蒂冈派回上海做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徐家汇教堂任职。27岁时不幸得一场大病使他双目失明。失明后的他，主要专任宗教文献盲文翻译工作。1966年10月，一群北京红卫兵联合上海红卫兵，冲击了这座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天主教堂，把建筑于十六世纪的古老优美的教堂内外砸个稀巴烂，许多稀世珍贵文物与书画遭受重大破坏。教堂大厦上装饰的绿色花玻璃是十八世纪荷兰工匠制作的，其高巧绝妙的工艺早已失传，这次却被全部砸碎了。一架十八世纪名贵风琴被毁掉，大批世上少有甚至绝版的圣经画册与宗教书籍被红卫兵抢堆广场上一把大火焚烧光。18名神甫、修女被列队当牛鬼蛇神残酷批斗。红卫兵硬逼他们把视为生命的“圣经”踩在脚底下，每人手拿红卫兵发给他们的《毛主席语录》，高喊“打倒上帝”、“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并要三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据说四个小时折腾下来，这些解放后苦苦支撑下来的中国神甫、修女们终于抵挡不住毛泽东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铁拳，一个个违心而痛苦地呼喊了打倒自己心中的主“上帝”，于是红卫兵允许他们脱离批斗。这样18人减到9人，再减到6人，又减到4人。这四个还不肯高呼“打倒上帝”的人被“加温”，各人戴着高帽子，挂上各种各样罪名的牌子。再不屈服，红卫兵上前，两个挟一个地强逼他们弯腰90度，接着干脆把顽固的神甫修女双手反背，做“喷气式”，甚至逼令他们跪下，疯狂地对他们拳打脚踢。狂热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致高喊“打倒上帝！”“打倒帝国主义！”“神甫修女是反革命坏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在如此人格侮辱、尊严践踏、肉体摧残下，又有二个支撑不住了，流着泪被迫叫了“打倒上帝”，另外一个已昏倒无法开口了。红卫兵们得意妄呼“胜利了”，谁知最后剩下的这位双目失明的终生修士却死不屈服。几个小时的折磨，红卫兵想尽了一切毒辣手段，凌辱他、殴打他，他紧闭嘴巴、失明双目本来就看不见，死死不吭一声。红卫兵敲开他嘴巴敲掉他牙齿，从他嘴里除了吐出牙齿与鲜血，发不出一丝声音。这使横扫长城内外、斗遍大江南北、战无不胜的北京红卫兵遇到了唯一气馁打不胜的人物。末了红卫兵得出结论：这个帝国主义驯养出来的宗教走狗、间谍教士不仅是瞎子，而且是哑巴。于是北京红卫兵们收场时把他押送给上海第一看守所，罪名是他那手摸写的密密麻麻的外文字母盲文记号肯定是间谍收集的情报。

这位誓死抵抗北京红卫兵野蛮暴行的终生修士，虽然双目失明，却不是哑巴，而是能说会道的善良的修道士。他之所以被关进一所，并不是上海市公安局立案捉拿的，是北京红卫兵视之“国际间谍”硬送进来的。他手摸写的盲文外文资料，经公安局技术鉴定，全非特务密码，更非间谍情报，纯属宗教内容，所以专业有识人士对红卫兵的无稽之谈也只得苦笑不已。关键

问题是修士顽固地不给北京红卫兵一点面子，也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一点面子。审讯他的人员，包括一所所长，训导员，当着我们这些同牢犯人面说过，只要他哪一天想通，写下放弃信仰上帝的念头，哪怕口头说一句，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可以释放他。偏偏这个不识抬举的修士甘愿关在一所与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对抗。他宁死不屈，休想从他嘴里吐出一句不敬上帝的话。他与政府、专政机关、凶狠的看守不断抗衡着。冬天来了，他只穿一套单薄的修士服。所里有意要冻他，以让他屈服，开口求饶，只发给他一套囚犯穿坏的破棉衣裤、一条薄棉被。在零下冰冻严寒天，他冻得索索发抖，冷得脸皮发青，手脚冰冷。他依然正襟打坐，嘴里念着圣经，从不向看守开口求饶。更令人气愤的是，年底国际红十字会邮寄给他的衣服、棉被，不知被哪一级一直扣押到第二年四月春暖花开时才给他。我们从包裹单上清楚的看出，国际邮包寄到上海的日期是去年12月份。最使我们惊讶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件事。所里犯人每星期五是开荤日，这一顿荤菜对所有在押犯人太珍贵了，因为你再多财富，做了囚犯是买不到这宝贵的一小块肉的，更不谈从最低营养角度说，这块小肉以及有限的肉汤对犯人有多大重要，每个犯人都渴望一周中的星期五。可巧天主教规定星期五是禁荤食的日子。实际上盲人修士也可以申请吃回教饭。看守和训导员都说过，只要他开口批判一声耶稣、上帝，马上照顾他，可是他断然拒绝了。就这样，修士从进监牢吃监饭开始至今二年多没有沾到一点荤食。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盲人修士体内得不到脂肪、蛋白质补充，自然骨瘦如柴。他靠的是什么样的毅力支撑？我简直无法理解。他说，他在学耶稣受难。众所周知，耶稣被四肢钉在十字架，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这位盲人修士二年多来精神上肉体上遭受严酷折磨，不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正直良心的人们谁见了都会伤心落泪。我对修士讲了古代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我劝他认错，好汉不吃眼前亏，来日方长，先出了地狱再说。修士却摇摇头，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比死的罪孽还深。他下定决心宁死不屈服。

宁做“反革命”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幸福地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文化教育。当时二哥文兵满腔热血，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朝鲜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立下军功，是抗美援朝功臣之一。家中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镶金边红幅。学校老师也在班上称赞我是“革命家庭的好孩子”。不料过了几年，我的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我自然被老师们指责为“反革命子弟”。由此我少年时代对“革命”、“反革命”一直懵然无知。读中学后，随着“阶级斗争”思想教育的深入，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就是“革命”，跟共产党走，做革命青年，成为当时的时尚潮流。后来三哥文辉指导我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人类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眼睁睁看着老实本分的父亲常遭里弄“革命群众”残酷批斗，我敬佩的辉哥同社会上大批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一被打成“反革命”，这使我对“共产党就是革命”的意念发生了根本性动摇，直至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发出本能的厌恶与愤恨，为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协助辉哥力挽狂澜投寄14封批驳“文革十六条”的“反革命匿名信”。“革命”与“反革命”究竟怎么回事？我亲眼目睹了同牢房1598悲惨遭遇，才是豁然贯通，洞若观火了。

这位从国外归来报效祖国的著名音乐家，上海交响乐团总指挥，是作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一所的。连看守也说他没有政历问题，没有像我这样“现行反革命活动”，只是在单位接受批斗时，他不但不老实斗私批修、认罪服罪，反而公开抵制、反对革命样板戏。众所周知，这时的八只革命样板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亲自缔造的，抵制、反对革命样板戏，岂非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罪行吗？这位饱学经纶的音乐家可说是自寻监牢坐了。别人谁都不可思议，可是音乐家关入牢房后却非常乐观，不以为然，我行我素，照样耿直地批驳革命样板戏。67年至68年间，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纷纷到一所来争夺一些有名望的人，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白相显耀”，以示他的那一派红卫兵小将的“实力”。可怜的1598，几乎每星期要被拉出去斗。记得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回牢房，人被打的鼻青脸肿。他却顾不得自己伤痛，反而慷慨激

昂地告诉我们，他是贺绿汀的陪斗对象。他一向尊重贺绿汀，所以虽是师兄弟关系，后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革命师生责令他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绿汀表功，说贺绿汀是大好人。这下子怒不可遏的红卫兵对他拳打脚踢，狠毒施暴。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毫不记恨在心。后来一次他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数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这位音乐权威却理直气壮的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优秀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革命造反派冲上批斗台，对他揽头揽脑一顿毒打。造反派们疯狂暴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他回到牢房一副狼狈像，脑袋被打的红肿起来，嘴唇被撕裂开，晚饭都无法吞咽。我们劝他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但他苦笑笑，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由于他被揪斗频繁，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前次老伤未好，后面新伤又添。每次总是拖着沉重脚步、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他刚松铐几天又被立即铐上，长时期地遭受内外摧残。看守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98每次批斗，每次不老实放毒，非得反铐不可！”批斗，毒打，反铐，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98这位身体本来纤弱的中年学者背已弯驼，头发从全白到脱落，但是他铁骨铮铮，斗志依然，傲立抗争。

我是音乐家邻坐，一直在关心他的不幸遭遇。他全然不顾自己一步步越加凶险，反在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他告诉我，贺遭几次抄家抢劫一空，遭受了人间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虐。那些自己学院的红卫兵学生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他头上，还逼令他在地上爬。音乐家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我的师兄与老师，他是爱国爱党的我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当年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的多少名曲，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绝灭人性的凌辱与暴虐，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他对江青很熟悉，听他说见过多次面，一针见血地抨击她是“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中国人民的大灾星！”音乐家告诉我：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艺名“蓝苹”，只是一个二流明星，有过多次风流新闻。后来同当时文汇报副总编马纪良（笔名唐纳）结婚没几天，竟出走“投向革命”，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个巫婆不知用什么手段得宠于毛泽东。当时党中央政治局明文规定她只照顾毛泽东生活，而不准参与党中央高层的政治活动，所以直到解放初年她还是无名之辈，谁知这个一向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破烂女人一旦得到毛的“令牌”，被封为“旗手”后，第一是报复，第二是掩饰。她千方百计掩饰自己过去的丑恶行径，而对当年稍知内情之人极尽打击报复的毒手。文艺电影界首当其冲，上官云珠跳楼自杀，郑君里惨死狱中，顾而已悬梁自尽，舒绣文被逼惨死，赵丹被囚牢笼……所有这些二、三十年代中她的朋友都遭殃惟难。她疯狂得双眼发红，成了一个肆意复仇的“女魔”，随时可咒人致死的“巫婆”！毛泽东指使她搞的是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知识分子的命”，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遇的一场空前的反革命劫难。讲到这里，这位音乐家、大指挥家情绪极其激愤地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好似吐出了一肚子恶气，嘴里哼着，手指动着打拍子，沉浸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的美妙乐曲中。（关于陆洪恩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调查，请参看王友琴：“中断的音符——陆洪恩之死”一文，载于本刊z k 0 2 0 5 c——编者）

音乐家太热爱音乐了，他视音乐为生命。他跟我讲起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历史的进步。他说，人文主义者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在各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产生了无数杰出天才的音乐家。他详情地介绍了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说到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青年法兰西……。尽管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但听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众多世界音乐

大师的故事，无不使我肃然起敬、大开眼界、见识非凡。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所谓“摧毁一切封资修”的残暴言行那样刻骨气愤与极端反抗，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无比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对江青一伙灭绝人类进步文化、赶尽杀绝优秀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恶行洞若观火，所以他宁做他们所说的“反革命”，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听说文艺单位认为他越顽固越反动就越要狠斗毒打他。这样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90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二个耳朵被打得流浓，眼睛浑浊，呆木般的比一个九十岁老翁还衰老。但是无力动弹的他还常翕动嘴角，低哼着“第九交响曲”“天鹅湖”等世界名曲，似乎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强劲力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音乐家没有了音乐等于断了他经脉。

可怜的音乐家遭遇使我猛然感悟：凡是对人类美好的事物、对进步人士残酷打击的人，不管他（她）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其实恰恰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而固执衷情于人类美好事业并以身相许的人，不管被强戴上多少顶“反革命”帽子，却才是富有革命骨气的志士仁人。98就是这样一个富有铮铮铁骨的知识文人，他对这场文化浩劫的深刻焦虑与锥心痛苦，使他不顾一切以命相抗。

碧血祭“文革”

在全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一个人胆敢“对着干”，宁做“反革命”，他的命运可想而知岌岌可危了。正如造反派看守们一再喊叫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不是吃素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1座1598连囚徒的吃口粗饭、睡块水泥地板的起码活命权利也没有了。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把1598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啃来吃。可怜的1598，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禁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我主动上前去喂他吃，谁知看守凶狠地训斥“不许！谁喂他饭就惩罚谁！”1598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看守听着不由愣愣，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眼见奄奄一息的音乐家委实不想活了，我无数次悄悄劝阻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要忍着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是有机会出去的。”我坐在他旁边，一直在照顾他，关系又好，同监牢友知道我的话对他有用，要我几次劝他：“为了儿子，你应该活下去。”音乐家对我的好心劝告总是苦笑地摇摇头。

反铐着双手是无法着地睡觉的，所以我每当夜深大家睡后，悄悄地帮音乐家把反铐转成正铐（我早已从204牢房飞行员处学会了开这种普通羊角铐的技术）。那天夜深帮他转铐时，他悄悄地告诉我家庭住址在那里。他有一个儿子。妻子已离婚去美国，在纽约演奏钢琴。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帮我转告家人，我是怎么样死在监狱的。”他这话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文革”到底。不久我发觉他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东西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他开始精神意识失控了。医生给他吃药退烧都无用。我们也无法阻止他，大家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训导员把我们监房里关的14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责令个个席地而坐。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1598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防扩散言论罪”，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

问：

“1598，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我们同牢房的13位犯人个个提心吊胆，惊怖莫名。照这几个月98的态度，根本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能表什么态呢？

训导室内仅仅沉默了一、二分钟。98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人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他根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热血沸腾地冲天长啸、滔滔不绝地直抒胸怀，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口若悬河，激扬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我们所有的人，而且连主持逼审他的那三个人也目瞪口呆地听他连珠炮似的演讲，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竟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

这位音乐家痛快淋漓地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他说，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落。”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1598话音刚落，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他足足演讲了25分钟！这在一所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特异场面。我们所有政治犯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98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惊颤震撼。我想98与我辉哥一样，又是个不怕死的铁骨义士，誓

死“尸祭文革”，英勇抗争到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似乎坐在我们身边的不是1598音乐家，却像“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一直在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你1598死到临头了！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我们都记录在案。”“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都为知识分子，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98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我们被赶回牢房时，98还坐在地上似乎恶气一吐为快，像一塑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我们大家深深为98叹息：“完了，98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我们心里明白，98刚才吐出一篇战斗檄文正是我们想说而说不出的，比起他来，我们是胆怯的，是苟且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98，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浑身血肉模糊，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命。我们都眼泪夺眶不住。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牢门关上后，我与3座胡兄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作孽啊！”晚上我躺在98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反铐转前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12点钟，我们被看守“嘭嘭”开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598出来！”看守又指着我说：“你帮他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看守知道我是他邻座，常在私下帮助他。我一边帮他整理对象，一边含泪向他告别，悄悄告诉他，你托的口信我一定帮你带出去。我扶他出了牢门，把他的东西拎到门外，看见走廊里已有三、四个囚犯像98一样被押走。几年牢狱蹲下来，我已知“整理好你的东西出来”这句看守话的含义，要么调牢房，要么判刑送提篮桥市监狱，要么天天盼望的释放回单位管制改造。可是半夜三更像98那样被匆率带走，凭老犯人观察经验，十有八九走上了不归路。这一夜特别漫长，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98的空铺位，想起了同关九个月来共同牢狱生活的幕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英雄交响曲》《天鹅湖》《睡美人》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一副狼狈惨相，他在训导室激昂的陈词向死神挑战的英勇无畏，现今他丹心碧血，尸祭“文革”，从此归宿到无底深渊的黑暗地狱……。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海外归来、赤子之心的音乐家之命！我情不自禁又想起二年无音讯的辉哥，惊颤无比地担心他的命运。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我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598的下场！”我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刊登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消息，十个犯人被处决，名单其中就有1598：“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我们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大家一言不发，听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盲人修士沉默片刻后问我今天几号？我说“14号”。他说：“98遇难日是昨天，是13日，是耶稣死难的日子。”

在“文革”暴政的屠刀下，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家陆洪恩大义凛然，喷洒了满腔热血，壮烈地倒下了。他那临刑前声讨暴政的英勇不屈形象，他那对着死亡放声大笑的无畏精神，在我记忆中永久铭刻，挥之不去，震撼万分。当我后来第一次走出一所，回厂监督劳动时，曾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照着他生前留给我的地址，去他家中看望他的儿子，不料但见门关铁锁，杳无人影，不知他的儿子去哪里了？听邻居说，“他儿子好象也进去了。”年轻人啊，你父亲死得好惨啊！但他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批斗活靶子

记得邻座1598音乐家生前几个月内，每星期总要被红卫兵小将揪出去批斗一、二次，每次回牢，总见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看守还悻悻地教训我们：“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又顽固不化，所以成了革命群众批斗的活靶子。你们自己识相点……。”言下之意，“反动学术权威”是批斗活靶子，如果“顽固不化”就该吃苦头。3座胡兄与我常说，像我们这种普通平民，工人农民（他原是新疆劳改农场职工）中的反革命，还没有资格到大会上去当“活靶子”。至于“顽固不化”，也就是在监狱内部惩罚。由于监狱内部看守管理人员自己忙着“造反”，很长时间少管我们，岁月匆匆，已到了1969年1月底。

“1548，提审！”一天牢房门外突然响起看守的叫喊。我顿时吃了一惊，心想自己已被结案近二年，长时期没有叫去审讯，怎么今天……？疑惑难解的我，被看守带进了审讯室。现今造反了的审讯室大变样，不像当年我刚进来时只贴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白幅黑字标语，而是满室墙上红红绿绿，贴满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一幅大标语我看不明白，上写着“落实‘六厂二校’斗争经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主持审讯的人员也变了，原先审我的一老一壮、一瘦一胖不知哪里去了，换了两个生龙活虎、臂带“公革会”造反红袖章年轻人。他们两位待我的严肃态度倒还可以，其中一位开腔道：

“1548，看到这横幅标语了吗？”他手指指墙上写着“六厂二校”字样的那幅。“伟大领袖毛主席最高指示，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中央文革充分肯定的‘北京六厂二校’阶级斗争经验，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大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进入了新高潮。无产阶级专政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与党内走资派的群众专政，把你们放到广大革命群众中去，放到社会上工厂、学校、农村，每个角落，作为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批斗，既加强对你们的专政，又教育广大群众。我们经过慎重研究考虑，看你长期来在监狱里情况，已有认罪、悔改表现，所以把你带到社会上去帮助你继续狠触罪恶灵魂，帮助你重新做人。1548，这是你服罪自新、脱胎换骨的大好良机，你要趁这机会，接受革命群众的严肃批斗，洗刷自己罪恶灵魂……。”

没过几天，二月上旬，我接连二次被押出一所，去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触灵魂，亲身体会了什么是触灵魂，实际似活剥皮肉的滋味。

第一次押出去那天，春寒料峭冷得狠，我身穿棉衣裤，双手被戴着手铐，一路上押我的审讯员反复叮嘱：“到那里老实点，不老实要吃苦头。”我还未想清“苦头”的含义，但从过去98的遭遇知道凶多吉少，我被押到徐汇区工交系统一座大礼堂门口。开始我搞不懂，我小小的一个残疾人拉到这里来干什么，后来知道，我单位属手工业局系统，同集管局、环卫局、房管局都统归工交口管。今天是徐汇区工交系统革命造反派群众云集大礼堂，开展大批判大斗争的现场阶级教育活动。我还没被推下车，已被高音喇叭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惊醒：“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刘少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忠！”我被冲上来的二个造反派押着，兜头颈项挂上了一块厚重的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刘文忠’三字还给红笔打上了叉叉。我被他们两个挟持着左右胳膊，边拉带拖，跌跌撞撞地推上大会批斗台。同我一排站着八九个“牛鬼蛇神”，我被造反派揪按低头、弯腰90度，根本看不清同受批斗的是些什么人。我位于正中，显然是“主角”。我还在猜想，我单位很小，全厂不到二百人，今天怎么来了上千名气势汹汹的“革命群众”？这时一个个造反派上台来揭发、控诉、批斗。我才从乱哄哄会场听清楚我单位的一些造反派的发言。主要是批判区工交政治部派到我厂的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我旁边陪斗的是厂原工作组领导和厂领导。造反派揭发他们曾称赞我是“好小囚”，包庇纵容我搞反革命活动，犯了严重的反动路线错误。上台揭发批判的造反派们声嘶力竭，兽性发作，对台上的“牛鬼蛇神”拳打脚踢，表示自己的革命行动。

“反革命分子刘文忠，你老实交代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老实交代你疯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勾当！老实交代你怎样得到工作组的包庇纵容！”大会主持人在高音喇叭中发出了喝令声。

“我……”我低弯着腰，脸朝台下，刚开口说话，不料二、三个造反派冲上台来兜头拦脑地毒打我，其中一个狠命地连抽我几记耳光。我痛彻心肺，不由侧脸望一望，见是本厂一位向来被人们称之“卑鄙小人”的家伙，现今臂戴造反派红袖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反革命分子刘文忠死不交代，顽固不化，打倒反革命！打倒刘文忠！”主持人又在高音喇叭中吼叫。

这时又有一批人冲上台来，揪住我，把我本已反铐的双手拼命向上提拉，我剧痛得冷汗直冒。几个造反派像发疯似的用脚对我一阵乱踢。我实在站立不住了，被他踢得顺势跪倒在台上。

“我来揭发！”已跪倒的我从这熟悉的口音中，知道是那个曾几次偷窃工厂工具、暗地干私生活，给我撞见出黑板报批评的人，他伪装积极，我心里暗好笑。只听见他气势横蛮、头头是道地揭发道：“反革命分子刘文忠，出身于反革命家庭，他哥刘文辉更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他们一家是反革命团伙，妄想罪恶变天，叛国投敌，勾结台湾、香港的国民党敌特分子，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伟大统帅毛主席，疯狂反对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革命罪该万死……”他慷慨激昂的揭发未说完，全场已响起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打倒反革命分子刘文忠！”

“砸烂刘文忠反革命狗头！”

“坚决支持无产阶级专政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刘文辉！”

“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全场激昂亢奋、声嘶力竭、轰然震耳的口号声重复着一遍又一遍。我听见“刘文辉”三字，不由强自镇定下来细听，没错，辉哥被残酷镇压了，三哥已死了。我顿时眼泪随着满脸血污与汗水滚滚而下，我二年来一直担心的恶运终于发生了！我已记不得浑身伤痛，汗出如雨，浸透棉衣，本来左脚残疾的我已瘫痪在台上。两边押挟我的造反派为不让“主角”完全瘫倒伏地，拼命抓住我的头向上提拉，面对台下群众。我这时任凭他们摆布，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默默念着“三哥死了，他死了，我永远见不到他了……”至于接下去的揭发批判，我一概听不见了，只觉得身边陪斗的那几个原来领导“扑通”“扑通”纷纷跌倒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昏昏沉沉被带出会场，推回牢房。同监牢友见我鼻青脸肿血泪满脸回来，一个个上前来关心我。我弯腰、跌倒被折磨了四个小时，残疾的两腿紧绷得铁箍似的，他们拉起我裤管一看，那腿像两根青紫的粗柱子。这一晚上我饭都吃不下，浑身虚脱之极，一言不发直流泪。几位最好的牢友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泣不成声地告诉他们：“我三哥……他……被枪决了！”胡兄马上安慰我：“不要伤心，文革这笔血泪帐一定要清算的，历史会讨回公道。”我低头称“是”，紧握双拳、满腔愤慨地表示：“我要为三哥报仇！”

心系辉哥魂

我知道了辉哥的噩耗后，日日夜夜在想着他。他昔日的音容笑貌、亲切关怀、谆谆教导时刻萦绕我心头；他对“阶级斗争”的切肤痛恨、对毛残害知识精英的愤怒痛斥、对文化大革命的决死反抗……一幕又一幕重现我脑海。所以我第二次押出去到某工厂批斗、又横遭凌辱等场

面，我已麻木不觉，无所记忆了。同监牢友从看守对我态度和缓上看出，我有可能马上要出狱，大家十分珍惜最后相处的日子，有的还托我出去后代向家里带口讯报平安。我只是呆若木鸡般地答应，心里却时时刻刻陪伴着辉哥的英魂过日子。

长期以来，经老犯人的指点分析，我心里一直在估计，辉哥是关在三楼北面那六间6平方米特别的死囚单身监牢，我天天期望总有一天在提审或放风时能偶然瞥见辉哥的身影，可是我一次次失望了，原来辉哥您早已出不来了，您永远出不来了，您这位怀有尧舜心、流淌荆轲血的好哥哥再也见不到您了……。

在人类历史上，两种人对同时代人与后来者的精神、心灵产生着巨大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底蕴，先知先觉。辉哥您是这两种人的溶和体。1958年春被错划成右派，您却“反右幸尝智慧果”，从此苦读了古今中外思想家经典名著。您目光过人、思想敏锐，笔头也十分勤快，不断地在许多著作上留下了自己的旁批，赞语，心得，或驳斥，或褒贬，全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睿智灼见。您从西方大哲学家、思想家黑格尔、费尔巴哈、杜威、安吉尔、厄德诺等人著作中追索，比较，深入钻研。为了更深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您刻苦自学大学英语，与一些在交大、外语学院当老师的老同学交流、辩论，共同切磋探求真理。朋友们都对您的敏锐洞察力敬佩而惊奇。辉哥那种摆脱禁锢的犀利思想，对我们兄妹来说最受益，最难忘。多年来，您一直将自己从书海中淘出的好文章、好报导、好思想，与我们兄妹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辉哥在浙江嵊泗厂时，源源不断地剪贴、邮寄给我们阅读。您对我们兄妹感情深厚，寄予希望重托。您总是谆谆开导，介绍所学的知识奥秘，开怀畅谈人生哲理，直抒、鞭挞世道之不平，坦诚披露平生抱负，忧国，忧民，字里行间跳跃一颗赤子之心。在辉哥读过的每本书页中，除了写满了智慧独到的批注、解释、阐发，还用浑涵遒劲的毛笔字写道“三十而立”。谁能料想到，恰恰当您刚交三十虚令的年头，竟被暗黑浑浊的“文革”浪潮吞进了监牢，又被习惯于残害知识精英的黑手灭绝人性地杀害了！

辉哥对我的教育培养恩重如山，可是您自己却长年累月生活在动荡不安、横遭迫害之中。早是“右派”的您又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嵊泗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上赫然写着：“被告刘文辉系一世仇分子，思想本质极端反动，对我党和政府抱有刻骨之恨，长期以来，一贯敌视我社会主义制度，散布反动言论……。”所谓“世仇分子”，真是共产党法院创造的特异“帽子”，因父亲刘宗汉“历史反革命”株连儿子刘文辉；所谓“极端反动”、“反动言论”，无非是辉哥一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这黑白颠倒的年代里，好心得恶报，蒙冤沉海底，辉哥您命运何等悲惨啊！但您表面顺服的心胸却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1966年回上海家中管制后，我看到您与父亲两人在我家居住的日晖四村扫大街、掏阴沟，受尽“革命群众”的奚落眼光，人身遭遇种种凌辱，我心好痛啊！这些非人待遇，对父亲这位“历史反革命”来说，八年来已司空见惯，而对您这样一位风华正茂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人来说怎堪忍受？！“文革”风潮狂起，家中不断遭受抄抢，您与父亲常被拉出去批斗挨打，派出所民警，里弄专政人员三日两头上门训话，周围邻居不少人用特务的目光监视着我们一家，昔日亲友见了我们象遇见麻风病人一样躲避惟恐不及。每天社会上横扫“牛鬼蛇神”的新闻、红卫兵暴虐、红色恐怖的环境使您骚动不安，愤恨满腔。我知道血气方刚，强忍克制的您终有一天会怒火全面爆发。

记得那天刮11级台风暴雨的日子，新村路上全是风雨刮下的枯枝败叶，阴沟堵塞、污水横溢。里弄专政人员与几名造反派上门，硬逼老父与您去清扫、掏挖。您说，父亲年已古稀，禁不住狂风暴雨，由你一人前去。不料造反派不答应，凶狠地训斥：“老反革命也要去，让暴风雨清洗他的罪恶灵魂！”辉哥怒火直冒，手挥大扫帚愤然表示：“谁想害我老父亲，我先给他拼

了！”造反派不由分说，冲上来架住辉哥，并把老父一起，拖到楼下门口现场批斗。这时风狂雨骤，竟将辉哥推出门外，任凭风雨暴淋。同时造反派们狂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文辉！”“反革命反扑，砸烂反革命狗头！”辉哥您挺身昂首迎着巨风，淋着暴雨，双手挥舞大扫帚，巍然不屈呼喊：“我死都不怕，还怕风雨吗？！”骤然回身，扬着扫帚直指造反派怒吼道：“砸吧！我是‘狗头’，你们是‘狼头’，是恶狼，今天横竖是个死，大家一起来砸吧！”辉哥拼命地将大扫帚向造反派头上掷去，吓着他们慌忙低头，猫着腰，快步逃出门外，消失在风雨中。事后，派出所民警来将辉哥叫去，狠狠训斥，关闭了一天。

随着时局发展，眼见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与党政机关忠良人士被打成“牛鬼蛇神”，您痛心疾首，长吁短叹，为国家为民族万分焦虑，一连几个深夜，您伏案绝书，写出了《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这一长达数万字的战斗檄文，又写了另一本批判资料《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记得你给我看了其中一小段，并解释说：毛泽东为了转移由他错误路线而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灾难后果的罪责时，他一度以退为进躲在幕后精心策划一种能嫁祸他人，转移人民视线的诡异理论，他热衷于国际纠纷，特别是中苏论战。他把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三年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人祸，从自己身上嫁祸转移到美帝、苏修、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他终于精心制造出一个新的理论，说什么“避免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法宝就是阶级斗争”，并要中国人民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不仅为苏共贴上现代修正主义标签，还为中国共产党内一切不甘心附首听从他的人和他构成威胁的人通通贴上修正主义分子、路线、头目的标签。他将阶级斗争的理论不断强化在中国人民头上，并把它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从而取代了建国以来应当大力进行的经济建设为主的事业。他不断挑起党内、人民内的矛盾，制造各种阶级仇恨、斗争、残杀，为了转移人民对他推行独裁、暴政、贫穷、愚民政策的不满，他用阶级斗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剑悬挂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头上，对一切稍有不满情绪、思想、言论的人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党内高官，用“阶级斗争”这把剑无情迫害残杀。您多么希望把这些独到之见写成文章，抄写成许多张大字报张贴到各高校中去，以引起全国大地的震撼。您对我说，决心学普鲁米修斯，在“文革”黑暗年代里点燃一把熊熊烈火，使人民觉醒，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并想用自己决死抗争阻止当局独裁暴行。所以一旦得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您更是怒火万丈，双目严峻、神态肃然地对我说：“现在对十六条的大力宣传，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再一次超常吹捧，是向人民灵魂中强行渗透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十六条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与控制是灾难性的，是使邪恶的‘文革’运动更为猖獗横蛮地发展，实行全民大迫害，我要揭露它，不能让它阴谋得逞，愚弄人民，残害知识分子和国家忠良。”

我看着辉哥的炯炯目光，知道您已决定了一件生死抉择的大事。您要我在门外放哨，自己在灯下伏案疾书。这是您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智慧结晶啊！长长的一篇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像一束巨型炮弹随时能引爆猛炸。我贴心追随您，到杭州去向全国十四所高校投寄。我知道您已立誓“不自由毋宁死”，我也一腔热血追随您，把这束“高能量炮弹”投向暴行政权的心脏。不料一个多月后，您我双双被投入了牢狱。

平心静气想一想，辉哥，您究竟干了些什么啊？您短短三十年春秋，十六岁起就弃学从工，肩负起因父亲遭难家境潦倒勉强维持老小糊口的重任；您二十一岁时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被当局扔入另册，遭世人白眼，您苦读，您抗争。您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文革狂澜初起时，辉哥就高瞻远瞩，奋起驳斥“文革十六条”。当初绝大部分人浑浑噩噩、茫然不理解，惟独您头脑冷静，独挽狂澜，敢于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批判矛头直指毛泽东，这是何等壮烈之举！

古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共产党人常把为人民服务口号挂在嘴上，实际做到了“民为贵”吗？而您做到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不敢做的事。在黑云压城，恶浪翻滚的文革

中，辉哥您个人的呐喊是微弱的，但那是黑暗宇宙之中一颗彗星，您用犀利的笔剖析文革反动本质，目的是想唤起早已麻木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的觉醒，为百姓争自由，为国人争民主。

记得您曾用雄浑的毛笔字给我写下了一段林肯的誓言：“每个人都应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使命感，努力拼搏是每个人的责任。我对这样的责任怀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耐心、毅力和信念。”

辉哥您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完了人生短暂的战斗旅程。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喷洒了满腔青春鲜血，铸成了一个写大的“人”字。正是牢友胡兄低声而铿锵地所说的：“你三哥是反击‘文革’第一人，历史将宣判他无罪而讨回公道！”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